

## 8、与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会晤

(20世纪)50年代中期，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两本书《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出版了。它们是关于致幻剂导致的迷幻状态的书。作者纯熟地描述了他服用仙人球毒碱的自体实验中体验到的感知觉和意识的改变。对赫胥黎来说，仙人球毒碱实验是一种洞察力的体验，使他能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那些总是隐藏在日常所见之中的事物，使它们显露出了固有的、深刻的和永恒的存在。

这两本书包括了对洞察性体验的本质的根本观察——在文化历史、神话创造、宗教起源和艺术创作过程中以这种方式理解世界的重要性。赫胥黎看到了致幻剂的价值，这类药物能给予那些缺少自发性感悟天赋的人去体验不寻常的意识状态的潜力，那些自发洞察性体验本属于神秘主义者、圣人和伟大的艺术家。药物因此能使得普通人能获得对这些伟大创造者的精神世界的领悟。致幻剂还能使人对宗教和神秘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并对伟大的艺术作品有一种新的和栩栩如生的体验。对于赫胥黎来说，这些药物是能够打开新的知觉之门的钥匙，这是一种化学的钥匙，而其他的方式，如冥想、隔绝、禁食或某种于珈练习也被证实是知觉世界的“门的开启器”，但是要经努力才能做到的。

那时我已经知道这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早期作品，像《点对点》(Point Counter Point)、《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许多个夏天之后》(After Many a Summer)、《视而不见在加沙》(Eyeless in Gaza)等几本对我非常珍贵的书籍。在赫胥黎的新书《知觉之门》和《天堂与地狱》中，我发现了对致幻剂体验的有意义的阐明，由此加深了我对自己的LSD实验的理解。

因此，1961年8月的一个早上，当我在实验室接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电话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和他的妻子要从苏黎世路过，邀请我和我妻子与他们在Sonnenberg旅店共进午餐。

这是一位钮扣中别了一朵黄色蝴蝶花的绅士，高大而尊贵，洋溢着和蔼亲切——这就是我脑海中保留的第一次见到奥尔德斯·赫胥黎时的形像。席间的谈话主要围绕神奇药物的问题。赫胥黎和他的妻子劳拉·阿彻拉·赫胥黎(Laura Archera Huxley)两人都体验过LSD和赛洛西宾(即裸盖菇素)。赫胥黎不主张给仙人球毒碱和这两种物质定义为“麻醉剂”，因为在英语和德语中所用的麻醉剂一词有贬义，把致幻剂同其它麻醉药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从语言学上来说也是这样。他相信这些能产生洞察体验的药物在人类进化的现代阶段是极重要的。

他认为实验室条件下的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致幻剂的影响下极强的对外界印象的敏感性和感受性，使得周围环境成了关键因素。当我们提到我妻子的老家在山区时，他建议我妻子在阿尔卑斯草原中服用LSD，然后凝视龙胆花的蓝萼以观赏创造的奇妙。

我们分手时，赫胥黎送给我一盘录音带作为纪念。这是一周前他在哥本哈根一个应用心理学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演讲《洞察性的体验》。在这一讲演中，奥尔德斯·赫胥黎讲到了洞察性体验的意义和本质，并且作为对它的本质的赞赏，他将这种世界观与对现实的语言上和理智上的理解进行了比较。

第二年，奥尔德斯·赫胥黎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本书，小说《海岛》(Island)出版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乌托邦岛屿 Pala，它企图将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的成就与东方思想的智慧相融合，以达到把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富有成果地结合起来的新文化。一种从蘑菇中得到的神奇药物 moksha(在梵文中意其为“释放”、“解放”)在 Pala 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药只能用于生命垂危时期。Pala 的年青男人们在成年仪式上接受这药，在一次生命危急的情况下这种药被分发给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在心理治疗的范畴内与一个精神上的朋友对话，它帮助即将死去的人放弃凡人的躯体，从而转化到另一存在之中。

在苏黎世的交谈中，我已经知道奥尔德斯·赫胥黎还会在他将要发表的小说中提到心理致幻药物的问题。书出版之后，他寄送我一本《海岛》，题字为“送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moksha 药的发现者，奥尔德斯·赫胥黎。”

赫胥黎于1962年2月29日写给我的信的主题是把心理致幻药物当成激发洞察力体验的一种方式，并希望把这些物质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我真诚希望这个以及类似的工作会发展成一种真正的洞察力体验的自然史，显示出由不同体质、性格和职业所决定的洞察力体验的所有类型，并在同时发展出一种应用神秘主义的技术—用于帮助个人从他们超越体验中获得最大收获，并把这种从“另一个世界”得到的洞察运用于“这个世界”的事务中。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德国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中译者注)曾写道“必须以爱献出从沉思中所获。”这才是必须从根本上发展起来的—在爱与才智中奉献来自于自身超越和天人合一的体验和洞察中所得的艺术.....

1963年夏末，在“世界艺术与科学学院”(WAAS)年会上，赫胥黎常与我见面。他在这次会期中对讨论议题的建议和贡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重要性上来说，对会议进程都有重大影响。

WAAS的建立，是为了使最有能力的专家们在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限制的论坛中，以涵盖整个世界的国际观点来考虑世界问题。该组织建立的结果是：以适当出版物形式的提议和想法可被置于负责任的政府和执行机构的处理之下。

1963年的WAAS会议讨论了关于人口爆炸、原料储备和地球食物资源的问题。这些相应的研究和提案收集在WAAS第II卷，题为“人口危机和世界资源的使用”。早在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能源危机成为流行用语之前十年，这些世界问题在此受到最严肃的探讨，关于它们的解决提案被送到了政府和负责的机构。此后，上述那些领域中发

生的灾难性事件充分表明，在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有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差异。

作为一种对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世界资源”议题的继续和补充，奥尔德斯·赫胥黎提出了一项议案，讨论“人的资源”问题，即对人的潜藏的、尚未被利用的能力的探索和应用。一个具有更高发展的精神能力、对事物的深度和难解之奇妙有着扩展的意识的人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更周全地考虑地球上生命的生物和物质基础。最重要的是，因为西方人具有的理性优势，如能发展出一种对现实的直接的、情感性的、不被言词和概念所阻扰的体验，将会有进化上的重要性。赫胥黎认为致幻药物可以成为这个方向教育的一种手段。曾创造了“心理扩展”(psychedelic)这个词的精神病学家奥斯蒙德(Humphry Osmond)博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做了关于使用致幻剂的有意义的可能性的报告以对赫胥黎表示支持。

1963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尔德斯·赫胥黎。他的身体已经明显患重疾，但是他的智力个性、他对人的内外世界的博大精深的全面知识仍然丝毫未减。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以天才的、充满爱的、善意的和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学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年11月22日，奥尔德斯·赫胥黎逝世了，就在这同一天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了。我得到了劳拉赫胥黎给她丈夫的兄弟姐妹朱利安(Julian)和朱利特·赫胥黎(Juliette Huxley)报告她丈夫最后一天的信的复印件。医生们让她为最坏的结局做好准备，因为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患的喉癌晚期通常伴随痉挛和窒息发作。但他是在安详和宁静中离去的。

在那天早上，当他已经虚弱得不再能讲话的时候，他在一张纸上写道：“LSD—用它—肌注—100微克。”赫胥黎夫人明白他的意思，她无视守护医生的疑惑，亲手为他注射了他想要的东西—她让他得到了那个 moksha 药。